“一带一路”:世界了解中国的钥匙

编者按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由新民晚报社与上海海事大学联合主办的《新民环球》首届青年专家论道暨“‘一带一路’:中国和世界的机遇”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京沪两地著名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回顾“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进展,聚焦“一带一路”的上海机遇,研判“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等课题。

《新民环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刊撰取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薛力**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拓展对外交往的维度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之后,2014年中国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有关地方和部门也出台了配套规划,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8月17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眼于“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战略。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明确,三大发展战略中,两个对内,唯一一个对外的就是“一带一路”。对于世界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结合,与全球治理结合在一起,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都将前所未有地扩展,“一带一路”主客观上都在促成亚欧世纪的到来。

中国重视亚欧大陆特别是亚欧大陆中东部地区,包括中东部地区附近的岛屿国家。一旦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且各个文明之间实现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亚欧大陆无疑将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板块。很难预言这一目标何时能成为现实,但中国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依然有效,但重心已经不限于埋头发展自己,而是增加了“共谋发展”的内涵。

从2013年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到今天,已经三年多。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广泛传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以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对“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行总结,无疑是必要的。

“一带一路”本身还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而且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提出来的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能够被这么多国家响应接受,有越来越多人研究,这在中国提出的国际倡议里面是没有第二个的。

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的一条全新的道路,需要用实践来证明。这需要相当长时期,遇到一些怀疑乃至质疑都很正常,重要的是态度与行动。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做的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管理

伊朗首都德黑兰地铁由中国公司承建

国家层面政府协调决策 通过机制框架推动合作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李开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在各个领域获得众多国际反响。但到底如何看待所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视角:

第一,经济学视角,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否赚钱?中国经济是否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受益?第二,安全学视角,即是否促进了相关涉我及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多边安全关系的增进?第三,战略学视角,即注重从整体性和长期性角度评估。所谓整体性,就是不但从经济、政治安全,还从国际地位等软实力层次评估。所谓长期性,就是考虑长远收益,而不是一时得失。

显然,“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个体层面无数企业的自发经济行为,也是国家层面政府协调下的决策。它既以经济考虑为主要推动力,又不得不面对沿带沿路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同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人心相通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有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超越经济层面和一国利益考虑的宏大政治抱负。因此,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应该从经济、安全、国际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方面着手。

经济层面。根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148.2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926.4亿美元,2016年分别为145.3亿美元和1260.3亿美元。这对于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切实意义,对于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也是强有力的推动。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带一路’与企业行为”研讨会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国企与民企代表透露出当前海外项目总体盈利的积极信息。

安全层面。体现得最突出的是南海问题。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上台后,对中国发展模式十分感兴趣,大力推动与中国经贸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与支持,2016年杜特尔特访华期间签订了总额135亿美元的合同。当前南海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菲律宾国内仍然有不少政治力量想借南海问题闹事,杜特尔特政府以坚定的姿态缓和南海争端、发展对华关系,与双边经贸合作的推进有着重要关联。当然也要看到,“一带一路”的推进虽有利于缓和南海争端,但如要推动该问题根本解决,还得着眼于争端本身,从政治安全方面构思方案。

国际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众多国家支持。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参加,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将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全球4000余名记者注册报道此次论坛。中国主导设立的亚投行更是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改良的成功案例。当然也要看到,一些国家仍然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度,大量中国企业和人员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如何与当地社会良好对接、维护并提高中国形象的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逐步实现,相关国家将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当然,命运共同体除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外,可能还需要建设在人文方面相互肯定、积极互动的观念共同体,也就是实现“五通”中最高层次的人心相通。相较利益共同体而言,这方面的进展可能暂时不那么显著。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推进。如何在通过机制框架推动相关国家合作、更好地推动政治引导和市场推进相结合,特别是发挥好民企的作用、强化“一带一路”的社会维度建设等方面总结经验,深耕提升,应该成为今后的重点方向。

中资项目亚欧顺利推进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张家栋**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骞**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龚婷**
同济大学博士后、捷克查理大学博士 **胡丽燕**

张家栋:“一带一路”倡议经历概念提出、框架建构和合作伙伴建立等三个阶段。倡议形成速度快,国际接受速度快,项目推进速度快,是目前的三大重要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动,是当前国际形势发展所致。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是中国式国际发展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综合体,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一种自主选择。

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在海上,南亚是必经之地。在陆地上,南亚既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甸两大经济走廊倡议的组成部分,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重要的影响。

在南亚,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进展顺利,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合作项目也重新启动,并且从港口等联通项目建设,向港口城、工业园区等深度合作项目发展。中国与尼泊尔的联通计划,也进入决策层的视野,可望在未来有重要进展。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推进,存在三种模式:

一是全方位推进型,以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为代表。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旗舰项目,反映了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南亚政策的深刻调整与变化。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涉及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一旦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

二是重大项目推进型,以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合作为代表。中国与斯里兰卡存在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中间虽经历斯里兰卡政权更迭的影响,最终还是回到合作共赢的路径上来。目前,中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和汉班托塔港工业园区,正在推进过程之中。

三是私有企业推进型,以中国与印度的投资和商业关系为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网络信息产业处于我国的新经济产业,在印度的投资和经营活动非常积极。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存量从2014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48亿美元。小米、华为、金立、阿里巴巴、腾讯、三一重工和特变电工等企业都在印度有重大投资项目或计划。截至2016年底,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存量就达到23亿美元。目前,中国企业在印度古吉拉特、哈里亚纳等邦的工业园区项目,处于稳定推进的过程之中。

多种模式成功开花结果

龚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进,“海外中国”迅速扩大,中资企业目前境外注册超过3万家、总资产近6.4万亿美元。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

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进展顺利,国际产能合作引领业务快速发展。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截至2016年底,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刘骞: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合作势头良好,其中,中国同中东欧16国之间的“16+1”合作平台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自2012年起,在“16+1”的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实现了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形成了《布加勒斯特纲要》《贝尔格莱德纲要》等重要文件,此外,还成立了“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16+1多边金融公司”也在筹划中。更重要的是,“16+1”框架的各当事国越来越意识到,“16+1”合作有助于深化双方传统友谊、扩大双方互利合作,因为,这不仅符合中东欧16国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全面、均衡发展。

胡丽燕:“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开辟了全新的路径,“16+1”合作框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16个中东欧国家是联系亚欧大陆的纽带,也是“一带一路”从亚洲延伸到全欧洲的重要区域。

“16+1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一批桥梁、电站、高速公路项目开始启动或开通。双边贸易额急速增长,2014年双边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600亿美元,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额增长达38.9%。2003年至今,中国对中东欧投资从不足1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投资由4.2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在金融合作方面,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分别在波兰、匈牙利、捷克设立分行。

加速全球经济治理进程

上海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立凡**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孕育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因素,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

纠正国际经济乱序

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复苏脆弱乏力,增长基础不稳,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开放与保守、变革与守旧、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凸显。但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双边和多边、区域和全球的合作势头渐起,各国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重视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经济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冲散经济低迷的阴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一,“一带一路”是对产业发展的协调,纠正国际分工的乱序。如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主要表现为,处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等价交换,使后者只能依附于前者发展。“一带一路”应该提倡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促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

第二,“一带一路”是推动调整现有不规则国际贸易秩序的强心针。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标准壁垒等措施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使用国家安全审查等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带一路”是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的挑战和冲击,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正能量补充,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一带一路”促进区域贸易的再升级,扩大全球化的落地效应,对世界其他区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以此变革国际贸易旧秩序。

第三,“一带一路”是对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否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地位不平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收益与风险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撑,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大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结算范围和规模资金融通,建设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成立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企业把握风险及时管控

第四,“一带一路”合理处理国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国际劳动力近20年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一带一路”由于中国利用现有的金融杠杆,促进大量沿线投资和创新园区开发,会吸引国际人才合理化双向流动。

第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区域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是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有力否定,但不等于经济新秩序就能自动建立起来。我们不应把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看作单纯获利行为,也不应有意追求贸易顺差,要积极转移成熟的制造业,帮助沿线国家多得利。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反对旧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富欺贫、以强凌弱的做法,坚决反对干涉主义。

企业加强风险意识

作为迄今人口规模最大的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38.9%。

不仅是货物贸易,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也表现不俗。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风险的管控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风险意识,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评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社区资源的维系;以及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

第二,加强资本运作本土化、民族化落地模式。

第三,注重差异性、多层次的推进模式。

第四,深化投资领域,增加民企活力。目前已经形成央企、国企集中投资传统行业,民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全面铺开的局面。

第五,加强“走出去”企业分布式发展联动模式。北美、西欧、东南亚是企业投资的首选地区,能源与矿产、制造业是投资的热门领域。其中,央企在能源与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境外投资显著,民企在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信、媒体、科技、能源与矿产领域更突出。

第六,识别高危地区风险。

总之,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各国的主权信用特征,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对国别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动态跟踪,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与当地机构合作,缓释风险。

合作推动融通融合 人心思治期待中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 **叶青**
复旦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高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蔡亮**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顾炜**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朱联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龚婷**

回顾3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开启了对欧亚地区结构的重塑进程。

大框架具有包容性

顾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时,欧亚地区正陷入发展僵局。“一带一路”为欧亚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为欧亚地区引入了强劲的经济体,与中国的合作为欧亚地区经济注入活力;第二,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欧亚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合作对象和合作机会。

首先,中小国家在经济上有了更多合作选择。例如,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即签署了备忘录,是首批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小国家的合作与追随,使欧亚地区结构开启了从“一强多弱”到“两强多弱”的转变过程。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包容性,并非构建封闭性的机制或组织。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2015年5月达成对接建设的协议,中俄没有出现争夺中小国家的现象,双边关系维持高水平运行,显示着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参与欧亚地区的认可。

第三,“一带一路”的大框架和融通特点,给欧亚地区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框架和平台。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给分裂的欧亚地区提供了以合作推动融合的机会,中小国家不站队、不选边,也可以开展合作,取得实际收益。

冷战后的20余年,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圈地运动”,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有助于打破现在的分裂局面,重新使欧亚大陆融通融合,放下成见和对抗的包袱,共谋发展。

搭上中国发展快车

叶青:当前,中东地区正处于格局转换的动荡期,总体来看,中东局势的“三化”特征突出:即集团对峙长期化、热点冲突工具化和主权空间碎片化。

集团对峙长期化揭示了中东格局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热点冲突工具化解释了中东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因为各方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有一方觉得有利可图,就可以挑起事件,激化矛盾,但各大国又有共同利益,不可能真正大打出手。主权空间碎片化已成为中东政治的一种常态,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纷纷陷入事实的割据和分治状态。

但从辩证角度来看,中东地区是乱和治并存,人心思治是大势所趋,中东主要国家都把经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沙特的“2030愿景”,也希望与“一带一路”对接,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同时,中东动乱不止,更能体现和平的珍贵,也更能体现出“一带一路”的意义,中东国家热切期待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为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朱联璧:自2010年英国保守党执政以来,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5年3月,英国率先表示加入亚投行。而在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访英后,英国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的支持和参与日益明确。

脱欧公投结果,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英国选民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确认将“硬脱欧”,并扩大与欧盟之外的国家的合作,有望延续并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西端支撑点的英国,虽然因为脱欧引发政局不明朗,也同样带来了新机遇和与中国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美日观望态度有变

高兰: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美日两国始终消极观望,2017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调整动向,特别是日本方面,4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希望加强中日关系。但是,美日海权同盟对“一带一路”的风险因素依然存在。

日本方面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可以带动陆路、海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抑制海盗、打击恐怖势力等,维护海洋安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让一些人感到忧虑。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从陆海两个方向积极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的合作共赢局面。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调整亚太战略,中国正在多方面构筑与美国、日本的海上安全对话渠道,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正在努力进行沟通,避免美日海权同盟的消极因素,推进与美日等国的积极合作。

蔡亮:从竞争心理来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感到忧虑,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过,日本部分学者认为,安倍内阁拒绝参与“亚投行”的做法并不明智,应该择机加入。

日本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安全上呈现强化日美同盟,借力周边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增强对华制衡,高调介入南海议题。经济上,日本通过战略性利用ODA(官方开发援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展开激烈竞争。如日本重点对南亚、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交通设施和市政工程等提供援助,显示出强烈针对中国的竞争意图。

“多做多说”主动发声

龚婷:随着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面临的各类风险不断增加。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可分为商业性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

商业风险主要涉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相关风险,而非商业风险则涉及地缘政治和外交、宏观经济和金融、法律法规、环境、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中资企业应该重视加强对东道国社会状况的调研、研判和预警,针对相关国家社会环境稳定状况和社会力量的调查应该常态化,并重视多渠道化信息来源,为科学研判形势和管控风险奠定基础。

另外,以前中国企业在海外习惯“多做少说”,做的诸多有利于当地民生的实事可见度低、知晓度少,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歪曲。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们应该从“多做少说”走向“多做多说”,提高公关和舆论能力,多管齐下综合利用各种媒介手段主动发声。

白俄罗斯首都建设中白工业园 本版图片 **新华社** 发